

doi:10.3969/j.issn.1672-4348.2016.05.007

“媒介权力”下的随笔写作

——以近十年来传媒明星的随笔为例

李保森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17)

摘要: 传媒明星的随笔写作近年来倍受读者热捧。时代转换的大背景下,大众社会的崛起所形成的“媒介权力”,为这些写作者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话语生产空间;而随笔的文体特征、自由精神,则成为他们的写作最适宜的形式,其中的优秀之作,贴近现实,紧扣时代,闪烁着智性的光芒,呈现着个人的理性之思与人文关怀。

关键词: 媒介权力; 随笔; 时代记忆

中图分类号: I207.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48(2016)05-0439-06

Essay writing under the media power:

Taking the case of essays written by media stars over the last ten years as an example

Li Baosen

(College of Literatu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17, China)

Abstract: In the recent years, the essay writing of media stars has been popular among the readers. In the background of age transformation, “media power” formed with the rise of the mass society has offered the writers with a unique discourse production space, as the stylistic features and the spirit of freedom in essays have provided them with the most appropriate form of writing. Some of the outstanding works are close to the reality, which flash the light of wisdom and demonstrate individuals’ rational thoughts and humanistic care.

Keywords: media power; essay; age memory

在日益冷清的图书市场,偶像、明星的写作与出版一直受人追捧,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畅销书案例,如以易中天、于丹等为代表的学术类普及读物,当年明月为代表的历史小说类通俗读物,周杰伦、刘若英、罗志祥等为代表的偶像明星类自传。这些书的出版与发行,带有商业策划的深刻印痕,内容浅显易懂,或删繁就简或迎合社会或追求趣味;包装华丽精美,印刷质量上乘且附有精美图片。但同属畅销书行列的另一类书,内化写作主体的经验,闪烁智性光芒,贴近现实,紧扣时代,并且由于“我”的在场,使得叙述与表达成为情感与

思考的载体和寄托,这即是以传媒明星为代表的随笔写作。这样的写作姿态与他们的知识构成、社会阅历、职业身份、精神境界、担当意识等有着密切的关系,而现实社会中的问题、隐忧与危机是构成他们随笔写作的重要因素。因而,与其笼统性地批评其带有畅销书的面目,不如通过“形式与内容”的解读,来展现其写作中所寄寓的内涵,看其如何为一个时代做注脚、存记忆。

这里所说的传媒明星,是指以现代传播媒介为活动平台,通过言说、访谈、写作等方式获取社会认可的一类人,典型如记者、主持人、撰稿者等。

收稿日期: 2016-04-13

作者简介: 李保森(1991-),男,河南武陟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散文。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文化遇“冷”是时代症状之一,但“敬惜字纸”的古老观念呈现的依然是对书籍、文化的尊重与仰望。因此,90年代以来的出书潮、畅销书不妨看作是传统认知与现代商业的一次耦合,并在此后不断发酵。传媒明星的写作也被编织进这一带有文化气息的商业策划中,且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与追捧。

大致来看,传媒明星的写作可以分为两类:一种为自传式,叙述个人的成长经历,有意“祛魅”,揭开公众关注的神秘面纱,通过展览自我收获读者,如鲁豫的《心相约》、曾子墨的《墨迹:留在生命和记忆中》、谢娜的《娜写年华》、水均益的《益往直前》等;一种为随笔体,写作者以个人经历为依托,事例与感悟叠加,内化自身经验或注目社会焦点,同时融入情感依托、理性思考与期待渴望,通过思想的灵动展示出深刻性,如崔永元的《不过如此》、白岩松的《痛并快乐着》《幸福了吗?》、柴静的《看见》、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敬一丹的《我遇到你》等。前一类写作与上文提到的偶像、明星写作并无太大差异,都属于“浅层写作”,只是因为职业不同而有着不一样的经历。因此,本文选定后一类为讨论对象。这既是个人阅读趣味使然,同时也是本人更看重这一类写作与时代之间的碰撞与互动,意在探究传媒明星的随笔写作特质及其如何得以形成潮流和热点,并由此阐发其随笔写作的价值生成。

考虑到近些年传媒明星随笔写作数量众多,若要一一梳理,非本文所能胜任。同时,限于本文着重把传媒明星的随笔写作作为一种现象来进行考察的前提,本文无意探求这些随笔的审美特质,而试图通过一些“叫好又叫卖”的作品,在典型案例中发现影响传媒明星随笔写作的普遍因素。因此,本文以白岩松的《幸福了吗?》、柴静的《看见》、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为讨论对象,因其既有独特性又有代表性,既以文采引人又具备质的要素,既关注个体与内心又牵连时代和社会,既流露思想锋芒又不脱离现实,既有赖于个人经验又有所升华。同时,这三者在社会角色、言说平台、内容选择方面也有所差异,这种差异使得其作为案例更具说服力。比如,同样活跃于荧屏的白岩松和柴静,一个试图通过外在事件和个人成长叩问内心,一个则尝试通过影响重大的社会事件唤醒公众理性,而以纸质媒介(报刊)为言说平

台的熊培云则把目光聚焦到乡土社会。

一、传媒明星的随笔写作

“作家对主体的选取,并不只是对某种形式的选择,它实际上关涉着作家对写作价值的认定,对一定的意识形态的主观倾向。”^[1]因此,本文的讨论不止于对随笔形式的探讨,而是通过写作内容与写作形式之间的互相碰撞,探讨传媒明星的随笔写作所呈现的关心天下、关注现实的人文情怀,所展现的关心时代、凝视人心的精神姿态。

《幸福了吗?》是白岩松基于自己职业的观察,既是观察中国,也是观察自己。在当下这个时代,中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可人的内心却日益浮躁、不稳定、缺乏安全感,“这些物化的目标陆续出现,但中国人也逐渐发现,幸福并没有伴随着物质如约而来,整个人群中,充满着抱怨之声”^[2]。因此,如同书名中的问号一样,作者通过一个个热闹而引人注目的话题,对内心、灵魂、精神进行深刻的把脉与叩问,并借此表达处于大时代下、大变动中的人的焦虑与渴望。但是必须承认,作者的叩问姿态并未得到始终呈现,会不自觉地滑入个人成长经验的回味和感叹。尽管有着这样的缺陷,但并不影响这本书对人的内心和幸福的关注与叩问。

作者把时代的变化与个人的成长历程联系在一起,以回头看的方式流露出怀旧的意味,并在这样一种姿态中,记录变革中的中国。记忆与现实的互相参照,比对出时代的变化,而人的情感体验也在这变化中留下难以抹去的痕迹。2008年的奥运火炬全球传递在法国的行程中受到干扰,引发了国内对家乐福的抵制,这一带有情感冲动的举止显得如此缺乏理性,但作者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发现,几乎每一代人都有一次与青春荷尔蒙有关的爱国主义激情爆发,像成人礼,也像与这个国家建立休戚与共的关系”^{[2]57}。在SARS防治、抗震救灾等公共突发事件中,在举办奥运会、处理对外关系等与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国人的素质接受着一次次的考验,在考验中生长着理性。在走向大国的过程中,国家在接受考验,公民也无法“弃考”,“如何调节好自己的心态去面对世界,正是中国走向大国的一个考验。或者说,它就是大国之所以成为大国的一部分”^{[2]49}。或许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作者才会对当下中国

人的心态进行深刻的观察与思考。

如果说《幸福了吗?》有一种内在化的倾向,多有感性的流露,那么《看见》则更像是通过对外在事件的记录,呈现自己的理性如何从中生成,并以此企求唤醒更多民众的理性觉醒。《看见》讲述了一个国家在变动时代中的一个热点事件,记录了她在10年间所遇到的人、所经历的事、所走过的日子。这些人事所引发的种种具体而微妙的感触,共同构成了她的精神成长史,影响了她看待世界、认识生活、分析问题的眼光和视角。而她所处的位置,所经历的思想波动,与这个国家的时代轨迹密不可分。双城连续服毒事件、药家鑫案、公民维权、家庭暴力、环境治理、医疗卫生、基础教育、土地拆迁、华南虎事件等具体领域的具体问题,无疑是这个国家在社会转型期间的种种可见症状。

《看见》中通过对陈锡文的采访而呈现农村问题的症结所在,不止于批评,也尝试着改变。陈锡文当过知青,做过农民,后来进大学当教授、做学者。但无论角色怎么转换,他的工作对象始终都是围绕着“三农”。他见过强制力下中国农民一夜之间分到的土地,也在一夜之间被收回。他说自己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向经验主义的转变,他常说:“最苦的总是农民,最无奈、最无助的也总是农民”,他认为解决土地问题的前提是“先要把农民社保这条路铺平,无论在犄角旮旯还是走到最繁华的地方,都在这张社会保障网的保护之下,都有生存的能力。”这无疑是与当下“三农”问题在整个中国经济板块的突出有着密切关联。可以说,《看见》中的每一个个案,都刻有时代的印痕,同时对整个社会有着深刻的影响。

与前面提到的两篇随笔写作相比,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涉及的视域更宽广,讨论的问题更集中,分析的力度更深刻,情感投入也更浓。他把关注的眼光向“下”,是对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演变的思考与表达。这本书是由作者为某报刊专栏写作所收成的集子,是对当下一系列农村问题的思考。在这里,作者既追根溯源,含情梳理百年乡村的轨迹,又瞩目现实,细致分析乡村中国的困境,涉及历史、政治、经济、法律、制度、文化等各个层面。在这里,有作者对故乡往事的深情回忆、对乡村现实的清醒认识、对未来的期许与盼望。

在书的开头,作者有这样的提问“为什么我们曾经‘热爱的故乡’,变成了一个自己不愿回去或回不去的地方?”这个问题既指向现实,也有关内心。乡村是诗意的、文化的与精神的存在,是记忆中的一份美丽,是游子远行他乡时的一份告慰,而卷入现代化征程中的乡村显得苍白、颓败、缺乏活力,以至于在城乡的参差对照中,显得面目模糊。熊培云对百年乡村历史的追溯正是源自这个心灵的困惑,他试图勾勒的是乡村未来的图景。

二、传媒明星随笔的特质

这几本随笔是作者们对现实的中国的观察与思考的结晶,尽管关注的问题不同、思考的方式有异,但仍然具有某些共性,具体表现为事件的公共性、思想的敏锐性、视野的历史性和情感的个人化融入。

这里所说的公共性,是指关系到大多数人切身利益、影响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事件。“公共空间”的催生与扩大,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产物。在中国,如何适应公共空间是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步骤。尚不完备的“公共空间”必然问题多多。《幸福了吗?》透过对时代的描述,直指人心,“偌大的中国,再难找到平静的心灵”。^{[2]10}作者立足于自己的职业经历,串联起自己的成长故事,在往昔与现实的彼此映衬中,揭示出作者表达的主旨:有所信仰、心灵宁静、获得幸福。这是对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个群体的整体性观察和集中性思考:物质基本得到满足后,我们如何保证心灵的饱满与充实?在《看见》里,作者以自己的采访和职业经历为线索,叙述了社会突发事件、公民维权、家庭暴力、环境治理、医疗卫生、教育、农村等具体领域的现实遭遇,感性的诉说中夹杂着难言的隐痛,个人的观察中隐含着多数人的悲哀。她的表达不偏激,温和的陈述承载着关注现实的激情。《一个村庄里的中国》集中考察、思考和表达的是中国农村的现实,这既与作者的乡土情结有关,也是由于“三农”问题在时下的紧迫性和突出性。在这里,作者从历史到现实,梳理了农村问题的各种症结所在,它的意义在于通过梳理把问题清晰化,并引起各方面的重视。

“人们通常把文学看作是一种哲学的通俗形式,一种利用生动的形式给予推广的‘思想’”。^[3]这种对文学与思想关系的看法,可以说是文化传

统规训的结果,但必须承认的是,两者确实具有互文性。比较而言,随笔所具有的思想性,比小说更显露,可以直接予以表达;其所涉及的事件,比小说更现实更真实更直接,是对当下现实的思想观照。《幸福了吗?》试图奉劝急速前进中的中国人,能够充实精神,净化灵魂,多听听内心的声音,富有理性,平和处世,在走向大国的过程中把自己塑造合格的现代公民。《看见》强调的是对真相的认知,是对洞见的深深迷恋。其表层化的叙事是现实中国的记录,而深处的内核则闪耀着思想的光芒。作者试图在对社会事件的梳理中更正人们看待事件、分析问题的视角,诸如“生和死,苦难和苍老,都蕴含在每一个人的体内,总有一天我们会与之遭逢”^{[4]95}、“新旧之间没有怨讼,唯有真与伪是大敌”^{[4]233}之类。而《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是在城乡差距持续拉大且城镇化进程加快的时代大背景之下,通过对乡村苦难历史的叙述,呼吁人们关注底层,关注乡村,既有现实关怀,又承载着传统的民本意识。

克罗齐所言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尽管时间以一去不复返的方式向前滑行,我们总是在与过去告别,但是历史却会迂回曲折地在现实投下某种或明或暗的影子,这两者的关系是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主题,也是作者写作的观念投射所在。本文所论及的随笔从现实出发,贯穿着历史性的视野,这不仅是说他们对所关注问题的探讨会溯源至历史脉络之中,也是指他们所关注的问题注定会成为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一环。无论是《看见》中反复强调的对“人”的关注,《幸福了吗?》对信仰的寻找,还是《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对中国农村现状的描述,都以不同的方式呈现了当下社会的某些症候,反映了当下现实的某种匮乏,同时也期待着中国的步步向好。因此说,历史既是他们分析问题的一个线索,也是他们寻找问题解决方式的一种途径。

情感的个人化投入,首先就体现在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上,由此传达一己之思和感悟。白岩松关注的是内心、灵魂、心灵、精神等更具内在性的命题,无论是叙述个人的成长往事,还是纵论社会的公共事件,都以个人化的方式来诉说,表达自己的所思和期待。在柴静笔下,“我试着尽可能诚实地写下这不断犯错、不断推翻、不断疑问、不断

重建的事实和因果,一个国家由人构成,一个人也由无数他人构成,你想如何报道一个国家,就要如何报道自己。”^{[4]1}因此,她常常展示出理性的一面,使个人的情感能够更可靠地挥洒,而不是肆意泛滥。而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里,无论是题材选取、言说方式,还是情感倾向、价值判断,都可以看出熊培云的赤子之心,流露出的是对底层、民众、乡村的深厚感情。于他而言,乡村是他成长的背景、生命的底色,也是这个国家的基础,因此选择它作为言说对象,理所当然,情感从中自然溢出。

三、媒介权力与随笔文体

上述论及的随笔作者,都有从事新闻媒体行业的背景。他们是荧屏或纸媒上的明星,凭借自身的言说、能力、气质、外貌等诸多因素获得大众的认可。而他们的随笔写作之所以能够得到广泛关注,赢得普遍赞誉,受到两重因素的影响:一个是时代转换的大背景下,大众社会的崛起所形成的“媒介权力”,另一个则与随笔的文体特征、精神传统有关。就前者而言,传媒明星作为媒介的人格化代表,凭借隐形的权力运作机制获得话语权,并由此在公众面前建构了个人的社会形象;就后者而言,则是指随笔写作所具有的自由随性、恬淡从容与思想容量等特质,能够使得他们建立在个人经历基础上的感悟与思考尽情地传达给公众。

在20世纪90年代建立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中,世俗的年代从天而降,此时推动社会分化的力量已经被经济、利益所代替。显然,这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变动,其显著特征是知识分子的式微与大众的崛起、精神的衰退与物质的兴盛、中心的瓦解与多元的并立。在很多学者看来,这种变动有着“后现代主义”的表征,但更符合现实的则是大众社会的来临:“且不论中国是否已经进入或接近了一个‘后现代’境况,也不论西方的‘后现代’情境是否真正‘填平了雅俗鸿沟’,在今日之中国,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大众文化’不但成了日常生活化的意识形态的构造者和主要承载者,而且还气势汹汹地要求在渐趋分裂并多元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5]3}

大众社会的兴起,迅速导致了传媒的兴起,这与大众的需求、传媒的特质有密切的关联,但这也

容易造成一种自娱自乐、沾沾自喜式的幻觉,“电视及其他大众媒体的兴起,与其说是搭乘上商业化快艇的社会民主化印证,不如说只是向我们展现了媒介权力的获得。”^[5]³⁶媒介权力是指“通过媒介话语的生产、流通和转换,媒介权力对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进行渗透和操作,从而获得对其他话语的操纵权”^[6],而伴随着媒介权力的获取与扩张,则是传媒明星或媒介知识分子的形成,前者为后者提供了一个便利的话语生产空间,一个独特的观察社会的视角与位置,一种不期然而所形成的召唤力。这种话语生产空间、视角与位置、召唤力,影响了传媒明星的写作视阈,也影响了读者的“期待视野”。因此说,传媒明星随笔写作的题材选择与观点彰显,显示了媒介权力的显性介入程度,而传媒明星的写作动机与实际效果(即读者的接受程度),则显示了媒介权力在这一写作与传播过程中的隐形作用。这二者互相作用,共同影响着传媒明星的随笔写作。

这些随笔选取的事件,在社会上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都曾引发民众的极大关注,如《幸福了吗?》中的SARS事件、《看见》中的药家鑫案、《一个村庄里的中国》里提及的土地征用等。这与其说是借用社会热点事件来制造噱头,引起公众注意,不如说是通过亲身经验与理性分析,重新叙述这些事件,阐明自身立场,唤醒公众的理性认知。同时,他们的观点具有深刻性、启蒙性以及人文性,这是因为他们自己在事件中更能贴近与感受到时代的症候:急速、浮躁、匮乏、渴望等,因此他们愿意以公众人物的正面形象引导民众的行为实践,比如理性、平静、文明等。

前文提到,传媒明星是媒介的人格化代表,这一角色沟通了民众与政治,使其获得了某种权威性,并在现实实践中让人们信以为真,这也能够解释新闻类节目主持人的言行容易受到公众的关注程度,而这种关注程度体现为庄严性,而不是关注娱乐类节目主持人时的消遣性。传媒明星自身生成的威信效应,影响了读者的期待视界,“所谓‘期待视界’,是指文学接受活动中,读者原先各种经验、趣味、素养、理想等综合形成的对文学作品的一种欣赏要求和欣赏水平”^[7]。也就是说,公众对这类随笔写作的接受与阅读,潜在地受到传媒明星角色优势的吸引,他们渴望在传媒明星的随笔写作中得到某种权威性的对时代的解读,

并能够得到有效的指示,来理解社会现实、明确生活方向、获取心理慰藉。

由此来看,传媒明星的随笔写作和传播与媒介权力的获得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不能忽略的另外一点,则是随笔自身的文体特征与精神传统。作为一种写作形式的随笔,为他们的观察与表达提供了有效的载体,使他们的思想得以通过文字呈现。

“五四”时期,周作人在谈到散文的发达时,说到“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他的兴盛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8]指出了“五四”时期散文创作发达的外因,说明了散文创作与时代的关系。或许可以说,自由时代是散文繁荣的必要条件,而散文自身的特性使这种文类在精神上与自由时代几乎是同构的。中国现代文学,在西方文学理论的参照下,确立了以小说、诗歌、戏剧、散文为主要类别的文学体系。在这其中,散文最为特别,没有固定的疆域,没有严格的操作工序,使得任何人的任何表达都成为一种可能,“在文类的内部,相比于小说诗歌戏剧这三种,它身上潜藏着极大的能量,那就是‘拿来主义’,它能够混合其他文类诸多的文学特征,来铸就自己,那种混血的、不纯的、难以界定的状态,大大提升了文类的自由度”^[9]。情感的起伏投射到语言中,心灵的影子可以在文字中寻觅,正如南帆所言:“散文对于文类的瓦解同时包含了心理模式的再塑造。它使既有文类所携有的时间感觉和空间感觉开始失灵,经验和意识的秩序遭到了改组。总之,散文将拆除旧有文类的固定视域,从而使人们有机会得到一套不同的立场、不同的眼界和不同的事物组织程序。”^[10]这一理解视散文为“泛文类”,即超越文类规范。

散文创作应和着时代脉搏和社会跳动,记录着个体的精神轨迹,凝固了某个时代、某一社会、某一群体的缩影。随笔作为散文内部的一种更小的单位,毋庸置疑地与散文共享荣辱与兴衰。大体而言,随笔、杂文、叙事抒情散文等是散文的主要形式,而就其艺术品质而言,随笔的艺术性不及强调苦心营造的叙事抒情散文,而其批判性又不如杂文来得直接、犀利,但也因此获得某种独特的话语生产空间。强调“静与从容”的随笔,能够因此更贴近时代本身的面貌,更真实地勾勒出观察对象的精神轨迹与写作主体的思想跃动,“作为现代随笔一个重要的标志,那就是重视随笔所表

现的思想内容。”^[11] 随笔创作所具有的即兴特点,使其能够就事论事,而其闪烁着的思想光芒,又使得对问题的思考成为写作的前提。虽然随着时空的转移,就事论事的“事”会褪色,但其意义不会凋敝,由于反映了时代而得以成为一种“缺席”的“在场”,是触摸和理解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有效提示牌。

90年代以来,随笔创作的逐渐繁荣,与时代的变化不无关系。时代的变化为其提供了良好的言说环境,也提供了繁杂的言说内容。传媒明星的随笔写作毋宁说是时代的生成物,取材于这个时代并对其进行梳理、描述与解读。

四、随笔写作与时代记忆

“一个不再背负着不堪重负的未来固然令人欣喜,一个不再拥有官方说法的前景亦使人快慰,但一个全然丧失了禁忌与敬畏的时代是否便是一幅乐观主义的图景?”^{[5]104-105} 这是著名学者戴锦华对20世纪90年代文化现象的一个总结式提问,而新世纪的实践证明这并非是杞人忧天,反而处处印证了这个疑问已演化成现实。变革时代的复杂情形以普遍化的方式投射到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文学承担着书写这一时代轨迹以及个体反应的使命。在文学内部,相比起来,随笔似乎具有更强的便利性和可操作性,社会情绪能够在随笔中得到描写与反映。

随笔的文类特征、精神传统使随笔写作与时代、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非常密切。传媒明星之所以选择随笔作为自身的言说方式,是因为其能承载作者对时代、社会与文明等的批评与思考,流露个人的内心与情感,表明自己的价值和立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大众崛起的时代背景、传播媒介的强势地位、传媒明星的话语权获得与随笔的文体特征之间彼此借重,互相成全。正是在这种互相联结的多重关系中,传媒明星的随笔写作渐成气候,并展现出独特价值和重要意义,即引起现实关注,同时建构集体的、时代的记忆。

前文提到随笔写作具有就事论事的特性,这意味着它必须对现实有所回应。这种“回应”与其说是给出标准答案,不如说是吸引关注的目光,让公众在阅读中有所体验和感悟,锻炼他们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和素质,如前文引用到的“如何调节好自己的心态去面对世界,正是中国

走向大国的一个考验”。这样,随笔写作不仅仅是对现实的描绘,同时内含反思的意义,其着眼点在于社会与民众的共同进步。

安德森曾提到印刷资本主义对民族认同的重要作用,即印刷技术穿越了同质的、空洞的时间,使内部成员通过想象产生一种强烈的认同。^[12] 而随笔写作对于时代记忆的建构与维持具有类似的功能,即依赖于同代人相似经历,通过写作,使不同地区、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人能够共享时代经验,取得对某一时代的共识与认同,“它(笔者注:指记忆)使‘集体’这个概念及其力量有据可循,并经由共享催生个体对集体的归属与认同”。^[13]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莫里斯·哈瓦布赫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认为“只有把记忆定位在相应的群体思想中时,我们才能理解发生在个体思想中的每一段记忆。而且,除非我们把个体与他同时所属的多个群体都联系起来,否则我们就无法正确理解这些记忆所具有的相对强度,以及它们在个体思想当中联合起来的方式”^[14]。由此看来,集体记忆来自于个人,但必须在集体中才能生成。集体记忆带有公共性,对其结构化的过程客观上要求以时间为刻度,因此说,集体记忆与时代记忆具有互文性,甚至可以互相指代,前者突出共同性,而后者强调时间性。

传媒明星的随笔写作具有建构记忆的功能,既是集体性的,又是时代性的。由于职业角色的优势,他们能够深入现场,获得第一手的、鲜活的信息,因此更能切中时代的弊端,呈现更为真实的时代图景。而他们对现实的梳理与描述,又必须在社会群体中获得共享和共识,才能够称之为集体的共同记忆。

近些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强拆事件,时时牵动着国人的神经。对此,熊培云曾深情地说到:“我相信,即使我不能阻止一些美好事物的离去,我还可以做另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就像影片《入殓师》里的大悟一样回到故乡领悟生命的真谛与尊严,让那些逝去的人与事,在我的回忆里获得温情与敬意。”^[15] 他的随笔既是通过往日记忆对照当下,又是通过记忆当下留待未来重温。读者与作者,在共同经历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因而把他们的随笔写作看做是对现实的“立此存照”,而这正是传媒明星写作的价值所在。(下转第489页)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办公厅 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加强校园不良网络借贷风险防范和教育引导工作的通知[EB/OL].2016-04-15.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2/s7060/201605/t20160504_241921.html.

[2] 肖岳.失控的校园贷[J].法人,2016(5):76-77.

[3] 江洪明.消费主义思潮浸润下大学生消费异化倾向的生成及其消解[J].长春大学学报,2015(1):113-116.

[4] 比尔·麦克基本.自然的终结[M].孙晓春,马树林,译.长春:吉林出版社,2000.

[5] 王久才,田金花.大学生借贷问题及对策探讨[J].中国商论,2015(16):73-75.

[6] 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EB/OL].2008-06-20.<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7408514.html>.

[7] 习近平.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 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EB/OL].2016-06-20. http://news.xinhuanet.com/2016-02/19/c_1118102868.htm.

(责任编辑：王明秀)

(上接第 444 页)

处于变革时期的当下社会,常常会如迷雾一般,让人看不清前行道路,但穿越迷雾的过程却无疑是一个社会的重要轨迹、是一个群体的精神标识。处于迷雾中的我们,常常会感到焦虑、压抑、迷茫、不知所措和缺乏安全感,这样的心灵体验与时代运转互为倒影。如果说写作是一种反抗,是一种

拒绝遗忘,那么随笔写作就是建构时代记忆的一种。而这种建构的稳固性与可靠性,与随笔的思想性呈现程度、公共性体现程度密切相关。在传媒明星的随笔写作中,笔者看到了这种努力,但同时对其商业倾向保持着强烈的警惕。

参考文献：

[1] 丁晓原.媒体生态与现代散文[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212.

[2] 白岩松.幸福了吗?[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

[3] 南帆,练暑生,刘小新.文学理论新读本[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216.

[4] 柴静.看见[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5] 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6] 李旭.媒介权力与媒介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1):97-103.

[7] 朱立元.接受美学导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61.

[8]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M].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231.

[9] 吕若涵.反讽与渴望——中国现代散文批评的多维话语空间[M].长沙:岳麓书社,2012:345.

[10] 南帆.文学的维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15.

[11] 黄科安.知识者的探求与言说:中国现代随笔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0.

[12]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叻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43-45.

[13] 赵静蓉.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2.

[14]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93-94.

[15] 熊培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485.

(责任编辑：许秀清)